

# 怎樣檢驗學術論文的內在質量

## ——“概念衡文法”初探

蔣重躍

---

**[提 要]** 學術研究是探求真理的活動，而把握對象的本質是探求真理的關鍵步驟。本質是以結構的方式存在著的，學術論文是學術活動的文字呈現，它的結構設計和論證策略應該是對象內在結構的揭示。要想瞭解論文的質量，就一定要看它能否有效地揭示對象的內在結構。那麼，怎樣才能有效地檢驗論文的內在質量呢？那就一定要運用概念知識。因為概念是關於事物本質也就是事物內在結構的知識。在實際的審稿工作中，我越來越相信，用概念種屬關係的規則來檢驗文稿結構設計是否合理，根據關鍵詞是否定義、分析和論證是否沿著文章最主要的關鍵詞的定義而展開，來檢驗文稿的分析和論證是否有力，是檢驗論文內在質量的有效方法，這個方法姑且叫做“概念衡文法”。

**[關鍵詞]** 學術規範 學術論文寫作 期刊編輯學 “概念衡文法”

**[中圖分類號]** C03; C3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6) 04 - 0103 - 11

---

### 一、問題的提出

怎樣評估學術論文的內在質量？這是學術期刊編輯本職工作中的基本問題。要做好編輯工作，就必須認真思考這個問題。近些年來，學術界和學術期刊界對學術規範的要求越來越嚴格，學術規範對於保證學術論文質量的作用也得到了普遍的承認。在實際工作中，大家對一般的學術論文質量標準和編排格式都已瞭如指掌。比如，學術論文一定要交代學術史，或者叫做學術綜述，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瞭解前沿，從中發現問題，明確下一步研究的起點和方向；學術論文要按照一定的格式和規則進行編排，如中國的《科技學術期刊編排規則》，美國的《APA 格式：國際社會科學學術寫作規範手冊》等。比較而言，交代學術史關注的是文章的學科研究內容，所以內在有一些；而寫作規範關注的是寫作在外觀上的形式，所以外在有一些。

那麼，對於學術期刊的編輯人員來說，要審查稿件的質量，僅憑以上兩條就夠了麼？某篇文章交代了學術史，使我們知道該文選題具有學術前沿性，而且它在寫作上遵守了某個公認的規

則，這是不是就說明它一定是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呢？在這兩條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東西需要衡量呢？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根據自己若干年來的工作經歷，認為，相較於文章的學術史和寫作編排規範來，文章的結構設計和論證方法更為內在，在這兩點上做得如何，可以反映文稿的“內在質量”，這也應該是學術期刊編輯要著重審查的。我之所以這樣認為，一是因為現在的確有一些文稿在結構設計上，在實際論證中大有問題，儘管它對學術史做了梳理，儘管它按照某個寫作編排規範來設計和行文，但仍然不能認為是一篇好文章，有時甚至不能認為是一篇合格的論文；二是因為歷來講文章學的，對於學術論文的內在結構設計和論證大多重視不夠，有的還產生了一定的誤導作用。

現在網絡上有許多教人寫作的文章，影響不容小覷。例如有這樣一篇網絡文章就明確地告訴讀者，所謂論證包括“舉例論證”（事例論證）、“引用論證”（道理論證）、“比喻論證”、“對比論證”（正反對比論證）。這四種論證方法還被作者稱作“例證法”（擺事實）、“引證法”（講道理）、“喻證法”（講道理）、“對比法”（講道理）。這裡所謂的“論證”，只有“舉例”、“引用”、“比喻”、“對比”這樣的呈現，卻沒有一字提到更有理論性的分析活動；尤其是把“引證”、“喻證”、“對比”當作是“講道理”的全部內容，顯然限制了講道理的範圍和深度。<sup>①</sup>

據我審讀稿件的有限經驗，我認為，對於我們今天某些學術論文來說，缺乏理論性仍然是最為突出的問題。相比而言，在學術史的梳理和寫作格式的規範上出了問題，是比較容易看出來的，如果在理論上，在文章結構設計和論證方法上出了問題，沒有一定的理論準備，是不易發現的。因此有必要加以討論。

那麼，缺乏理論性在文稿中有怎樣的表現呢？出於職業操守，我不能拿作者的來稿在這裡做點評，為了說明問題，只好一般性地談談結構設計和論證方法這兩方面的情況。

其一，結構混亂。學術論文一般都由節、目構成文章的結構骨架，但有的文稿沒有遵守寫作的基本原則，節、目混淆。例如，同級標題之間不具有邏輯上的平行關係，導致論證無效。還有，雖然節目各自平行，但是，節與節之間，目與目之間，界定不清，有的甚至相互重疊，這就帶來另一個嚴重的問題：往往作者安排在某一節下的某些目，看起來放在另一節裡也合適，反過來也一樣。總之，有這樣兩個問題，一旦展開，文稿成了一鍋粥，論證效率大減，讀起來自然會感到重複和拖沓。

其二，論證缺如。最常見的是不知論證為何物，誤以為有個想法，舉一大堆例證，有正有反，就算是論證了，所以在提出論點後，便用大量經驗材料（所謂“例證”）或他人成說（所謂“引證”）撐起篇幅，結果，外觀臃腫累贅，內容卻往往是空洞無物的。

我之所以提出這兩個問題，就是為了提請注意，希望我們做學術期刊編輯的朋友們都來重視學術論文的結構設計和論證方法，也就是衡量論文的內在質量。

在實際工作中，我曾用“結構合理”、“論證有力”來表揚某篇文稿質量上乘；反過來，也用“結構混亂”、“論證不清”來批評某篇文稿質量不高。近些年來，我時常問自己，這樣的評價究竟是怎樣得出來的？我憑什麼這樣說呢？文稿的結構是合理還是混亂，論證是有力還是不清，有沒有具體的、可操作的、可以拿出來觀察、衡量、討論的客觀標準呢？我越來越相信是有的。邏輯學家認為：“概念是判斷、推理與論證的基礎”；<sup>②</sup>“沒有明確（內涵外延都明確）的概念，就不會有恰當的判斷，就不會有合乎邏輯的推理與論證。”<sup>③</sup>我讀到的許多學術論文，

判斷、推理和論證上都看不出有多大問題，一般文章學所要求的引證、例證、喻證、類比、對比等樣樣不少，可是總感覺缺乏應有的力度，總感覺不像是在分析和論證，總感覺沒有進入事物的內部，沒有把握對象的內在本質。經過若干年來的學習和思考，我確信，問題出在作為論證基礎的概念上面。忽視概念知識（也就是理論性）在論文寫作中並非個別現象。為了能夠真正瞭解論證是否有力，目前我的做法是把概念知識遷移到審稿工作中來，用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諸規則，也就是用定義和劃分的知識來審查文稿的結構是否合理，論證是否有力。我曾把這種方法叫做“概念衡文法”。以下是我在工作中的一點小小的體會，尚不成熟，斗膽拿出來，向大家求教。

## 二、關於文稿的結構設計

概念是表示事物所具有的某種屬性的語詞，是人類關於世界的抽象認識的成果，反過來又是人類有效地把握世界的工具；學術論文是人們認識世界的理論性成果，是通過概念認識世界、把握世界的成果。所以，學術期刊編輯人員要學會運用概念知識來做衡文工作，至少要關注文稿的結構和論證質量問題。首先談談文稿的結構設計問題。

### （一）檢驗文稿的研究範圍是否清晰

學術論文都是圍繞著問題展開的，都有研究的對象或主題。這個對象或主題可以是具體的事物，也可以是抽象的道理，不管哪一種，都要以概念的形式呈現出來。既然是概念，審稿時就一定要按照概念的規則來審查。具體而言，學術論文要遵守科學規範，就一定要把事物和道理上升到概念的高度上來把握，就一定要保證研究範圍清晰明確，這個範圍既包括研究對象的範圍，也包括研究資料的範圍，這是科學規範的要求。

#### 1. 看研究對象的外部邊界

眾所周知，概念需要定義。定義，英文做 definition，這是名詞，動詞 define，它的基本含義就是“限定範圍”。學術研究首先要將作為研究對象的具體的某物或抽象的某理上升到概念的高度上來考慮，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劃清某物或某理的外部邊界。道理很清楚，邊界不清，資料範圍就無法確定，在討論與他物、他理的關係時就無法準確地判斷和推理，隨後的研究就難以進行下去。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語詞大國，詩詞歌賦小說戲曲樣樣不少，且都達到了較高水平，可偏偏不是一個概念的大國。我們習慣於把任何對象都納入到我們的語詞描述當中去，而不習慣用概念來分析和批判，這在學術研究中也有突出表現。<sup>④</sup>近代以來，凡在學術研究上有所成就者，都是在概念思維上有所領悟的人。當然，這樣的人畢竟很少。著名歷史學家陳援庵先生（1880～1971）就是這樣一位。在歷史研究中，形式邏輯很難受到重視，可陳援庵先生的研究卻體現出了鮮明的邏輯性，發現這一點的是一位著名的日本學者，他叫桑原鷺藏。

陳援庵先生早年有一部名著，書名叫《元西域人華化考》（完成於1923年）。桑原鷺藏教授指出：這部著作的最大意義在於作者在序言中“先限定西域之範圍，以解釋華化之意義；於此可證明著者之研究為科學的也。此為從來支那學者所不經見”。<sup>⑤</sup>把確定研究對象的範圍、給重要概念下定義當作科學方法，而據此斷定陳氏此書的突出價值就在於這種科學性。這個認識的確是獨具慧眼的。可惜，這樣的評價在今天的中國學界仍未能受到很好的理解和重視。

作為學術期刊編輯，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可以見到大量的文稿忽視對研究對象或主題作概念的界定，結果導致邊界不清，資料的合理範圍、論述的清晰度都大打折扣。

## 2. 看研究資料的範圍

中國學術界對陳援庵先生歷來就有很崇高的評價，但給出的理由似乎並不恰當。例如，流行的看法認為陳先生講求“竭澤而漁”，好像他的學術特點和成就只有資料豐富這一條。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看法，大概與中國人喜歡以“博雅”和“博聞強識”誇獎學者有關。其實，這樣的誇讚是模糊的，遠不如“科學性”更有說服力。黑格爾說過：“學識廣博尚不能算是科學。”<sup>⑥</sup>相對於學術資料的數量來說，學術方法的科學化改進更為關鍵。道理很清楚：沒有合理的範圍限定，在多大範圍內搜集資料都不知道，如何做到“竭澤而漁”呢？所以即使是查找資料，限定範圍也是先決條件。可見概念定義的重要。

### （二）檢驗文稿的內部結構是否合理

學術研究的目的是要把握研究對象，而弄清內部結構是把握對象的具體方法。一般說來，把握對象大致有兩個途徑：一是經驗的，一是理論的。經驗的就是關於對象的感覺、知覺、印象等知識。這些知識有直接性的優點，可是也有零散、片面、不成系統的缺點，而且隨著感覺主體的不斷變化而隨時變化，因而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理論的則是關於對象的概念性把握，即把對象當作內涵和外延相統一的，當作具有種屬關係的，當作不變的東西。理論的途徑顯然是間接性的，但卻可以全面地、穩妥地把握對象。只有把經驗的和理論的結合起來，才能兼收直接性的真實和間接性的全面的優勢。我們要把握對象，就是要使我們的認識符合對象的情況。經驗的直接性，理論的全面性，兩相結合，才是有效把握對象的好辦法。聯繫到學術論文，就是資料的真實性，問題的全面性，兩者結合，才可望寫出如實呈現對象真實情況的好文章。

怎樣才能使問題的研究達到全面性的目標呢？那就要按照表現該問題的概念的定義和劃分來進行。

在實際工作中我經常會讀到一些文稿，滿眼都是資料或論據，很難找到清晰的範圍和結構。而讀到好文章時卻會發現，資料不是隨意地堆積在那裡，而是有結構地呈現出來的。這結構是憑什麼設計出來的？作者自己也未必想過，其實是他的邏輯思維在起作用，他的文章與概念的基本規則，即概念的種屬關係，概念外延的合理結構相符合。因此，我認為，作為學術期刊編輯，衡量學術論文的結構設計是一項重要任務。初步說來，有以下兩點需要注意。

### 1. 看文稿的節目設計

衡量文稿結構是否合理，重要的是看節目設計是否符合概念的種屬關係。其實文稿標題和“節題”之間，“節題”和“目題”之間，一般應為種（genus，或譯“綱”）和屬（species，或譯“目”）的關係，也就是上下位關係。節與節，目與目，都應該是平行且相互排斥的，如果做到了，再看文稿設計的節目與所有資料是否吻合，節目和資料不多也不少，恰好吻合，這就說明文稿節目設計是合理的。

以陳援庵先生《元西域人華化考》目錄為例，可見文章內在結構的合理設計。除了卷一“緒論”限定範圍，交代背景，卷八“結論”做全文的歸納和總結之外，其他六卷分別是“儒學”、“佛老”、“文學”、“美術”、“禮俗”、“女學”，根據陳援庵的具體呈現，它們做到了相互平行和排斥，大體上可以劃歸一類，相當於屬概念，統統納入“元西域人華化”這個種概念內，看起來，資料是窮盡了的。其中，六個目與各自下屬的細目，雖劃分標準不一，但各自都可構成種屬關係。例如，“卷二·儒學篇”中，“一、西域人之儒學”為總論，下面“二、基督教世家之儒學”、“三、回回教世家之儒學”、“四、佛教世家之儒學”、“五、摩尼教世家之儒學”

做到了既平列又排斥，構成了目（此時的“目”已轉升為“種”概念）下的屬概念。“卷三·佛老篇”之下，“一、西域詞人之佛老”、“二、回回教世家由儒入佛”、“三、基督教世家由儒入道”也是既平列又排斥，共同構成屬概念。“卷四·文學篇”之下，“一、西域之中國詩人”、“二、基督教世家之中國詩人”、“三、回回教世家之中國詩人”、“四、西域之中國文家”、“五、西域之中國曲家”總體構成屬概念。不過，其中似乎還可以再抽出一層：詩、文、曲三類，詩下含現在的一、二、三細目，這樣或許更精準一些，當然也要繁瑣一些。不過，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精密是具有一些繁瑣性質的。”<sup>⑩</sup>學術研究理應以精密為目標，繁瑣作為代價也是必須的。“卷五·美術篇”之下有“一、西域之中國書家”、“二、西域之中國畫家”、“三、西域人之中國建築”三部分，比較清楚，是嚴格的種屬關係。“卷六·禮俗篇”之下有“一、西域人名氏效華俗”、“二、西域人喪葬效華俗”、“三、西域人祠祭效華俗”、“四、西域人居處效華俗”，也是標準的種屬關係。“卷七·女學篇”之下有“一、西域婦女華化先導”、“二、西域婦女之華學”，大概由於資料有限，只好從簡，所以看起來與其他五節標準不一，但卻是既平列且排斥的，仍然符合概念外延劃分規則。

有時在審稿中，我常常邊讀文稿邊在心裡面把文內所有節目標題拆散打亂，再按照概念的種屬關係重新排列組合，看能不能復原，如果可以，就說明文稿結構設計是合理的。《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文的節目標題比較容易識別和復原，可見其結構是比較合理的。而有的文稿節目設計本來就不合概念種屬規則，打亂後也無法合理地重構，顯然，這樣的文稿是有問題的。至於另外一些文稿，內文不設文字標題，只列“一”、“二”、“三”……或“1”、“2”、“3”……遇到這樣的文稿，那就只好根據內容來衡量了。

## 2. 看文稿的資料與結構的關係

除了外部邊界或總的範圍以外，資料也不是囫圇一堆，更不是鐵板一塊的，它的內部也是要繼續劃分的。換句話說，“竭澤而漁”的“澤”也不是簡單的死水一潭。歷史學家劉家和先生在談到陳援庵先生的“竭澤而漁”方法時曾準確地說過：“必須把‘澤’看做橫向具有結構而縱向又具有層次的整體。”<sup>⑪</sup>與文稿的主題範圍和寫作策略相一致，資料也要按照文中的結構劃分為不同的部分和層次。這樣看來，搜集資料決不是簡單的體力勞動，不能滿足於外部範圍的確定，不是單純的數量越多越好，而是要做到內部結構合理、層次分明的，這就要求數量適當而具有典型性。我經常打這樣一個比方，譬如：有這樣兩種情況：其一，已知某課題應由五部分組成，某位作者對其中某兩個部分積累了100條材料，而其他三個部分則沒有準備；其二，另一位作者對這個課題的每個部分各準備了10條典型材料，材料總數是50條。問：這兩種情況哪一種的材料更充分呢？是100條呢？還是50條呢？看來不能用絕對數字的多少來判斷。由此也可見，根據概念外延劃分的規則，同樣要求資料搜集工作也要按照概念的結構和層次來完成。我們看一篇文章是否可用，也要看它的資料工作是否符合內部結構的設計或曰概念外延劃分的規則。

## 三、關於文稿的論證方法

傳統文章學在談到議論文時，認為“發揮自己的主張，批評別人的意見，以使人承認為目的的文字，稱為議論文”。戰國縱橫家的“策論”或“說辭”，往往是以“發揮自己的主張，批評別人的意見，以使人承認為目的”。<sup>⑫</sup>古希臘有所謂“修辭術”（*ῥητορεία*，拉丁轉寫成 *rhetoric*），與“策論”或“說辭”很相似。它是以演說的方式煽動聽眾，在城邦政治生活中發揮

著特殊作用。許多智者就以教授修辭術為謀生手段。“策論”或“說辭”和“修辭術”的方法與傳統文章學關於議論文方法的表述較為接近。不過，這樣的所謂議論文主觀性較強，與現在的學術論文是不同的，後者的目的是探索真理，講究客觀性和科學性。由此可見，傳統文章學關於議論文寫法的主張，不一定適合現在的學術論文寫作。換句話說，學術論文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議論文，不能用傳統文章學的規則來衡量。這是我們學術期刊編輯人必須重視的。

學術論文以追求真理為目標，那就要求編輯在審稿時，必須遵循學術研究的規範，檢驗文稿的論證是否符合科學性的基本要求。我的做法是看以下兩條。

#### （一）看論證是否從概念分析開始

早年的文章學家認為：“議論文實際上就是對於所提出的命題所給的證明……命題是議論文的根本。”“做議論文的第一步，就是認定自己所要提出的命題。命題確定了，然後加以證明。”<sup>⑩</sup>有的學術論文的確是以提出命題、論證命題的方式進行的；但也有許多學術論文則採取了提出問題、回答問題的方式展開。問題邏輯與命題邏輯究竟還是有所不同的。晚近的文章學家則認識到：“論證，實質上是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一個過程。”“論證的內容要素有四：說明、證明、闡述（亦即論述）、辨析，它們就構成了論證的全部內容。”<sup>⑪</sup>在解釋“說明”時，甚至還提到“概念說明”對於題旨說明具有重要意義；甚至把“精確定義”作為科學論文和學術著作的說明方法。但是，究竟怎樣給概念下定義？學術論文的概念定義怎樣進行，還是沒有具體的介紹。

有的研究者已經認識到分析是論證的主要方法，並且指出分析法是“把整體分解為部分，把複雜事物分解為各個要素，並對這些部分或要素進行研究和認識的思維方法”。<sup>⑫</sup>這是對的。但什麼是“事物”？“事物”以什麼方式在文章中呈現出來？分析從哪裡開始？持以上論點的研究者往往又返回到具體的經驗事實上，主張從經驗事實整體開始，這樣的“分析”，邏輯性反倒大大降低了。<sup>⑬</sup>

按“分”，《說文解字》：“別也。從八刀。刀以分別物也。”重耀按：會意。“八”有相分之義，“刀”為分別的工具，合起來意謂用刀分物。“析”，《說文解字》：“破木也，一曰折也。從木從斤。”<sup>⑭</sup>亦為會意字，“木”為樹木，“斤”為斧子，以斧斫木，也有分開之義。“分”“析”兩字連用，意思就是打開。

分析是打開。所謂“解釋”，也有打開之義。不但中文，就連英文的解釋（explain, expound），也有打開之義。那麼“分析”究竟要打開什麼呢？前文已經說過，學術論文討論的不管是具體的事物，還是抽象的思想，都是用概念來表示的。既然如此，那麼，要認識這些事物，認識這些思想，理所當然地，就必須提升到概念的高度上來進行。可見，分析所要打開的，不是別的，第一個就是概念。而要打開概念，除了定義（含劃分），沒有其他辦法！

我以為，分析應從概念的定義開始，這是古代中國人作文時缺少的。古人習慣的是另一種方式。《荀子·勸學》是一篇名文，多年來保留在初中語文課本中，它的行文方式代表了古代文章寫作的主流方法，值得認真思考：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輒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輒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勸學篇》開宗明義，第一句就是“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這是全文的總論點，以下都是關於這個觀點的說明。仔細品味，發現本段中“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與

總論點有某種內在聯繫，即要想明智而不犯錯誤，就必須博學和反省（據此推理：而要博學，當然就要不斷地積累知識。不斷地積累知識就是“學不可以已”）。至於“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輅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輅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云云，與作為總論點的“學不可以已”並不存在必然的聯繫，它們只是作為一些物象，供作者取其某方面的屬性，以為譬喻，映襯總論點所表達的思想。

通讀全篇，發現還有“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可以理解為以博大精深的“先王遺言”為學習內容；“學也者固學一之”，以專心一意為學習方法；“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則以完整純粹為學成的理想境界。讀者可根據這樣的內容、方法和目標來判斷“學不可以已”是否成立。《勸學篇》近兩千言，與總論點有必然聯繫的不足百字，絕大部分內容則是夾雜其間的譬喻和引語。

《勸學篇》是不是議論文還不好確定，在我看來，它倒更像是一篇詠讚“學”的散文詩。荀子並非一定要把探求真理作為自己寫作的目的，在他看來，“學要持之以恆”是普遍的信條，根本無須論證，《勸學篇》的行文大部分不是論證的，而是推類的，這在古人那裡，本是自然而然的，不必大驚小怪。幾千年讀下來，都認為是美文，沒有什麼問題。可是，如果換一個角度，對“學不可以已”提出一個“為什麼”的問題，情況就會陡然變化（其實蘇格拉底在古希臘的影響就在於對大家習以為常的“美德”提出了“是什麼”的問題，從此扭轉了希臘哲學的前進方向）。

在荀子看來，君子認為“學要持之以恆”是沒有問題的。可是我們卻不禁要問：為什麼呢？一旦提出“為什麼”的問題，就要求下文提供證明。偏偏《勸學篇》的下文沒有任何概念性的證明（因為荀子並未提出“為什麼”的問題），有的只是一個接一個的舉例、隱喻、引證、對比，力圖用淺顯切近和鮮活生動的事例說明文章的主旨。文字生動而貼切，但其間卻很難有必然性可言。上文列出的與主旨有內在關聯的那幾句話，卻淹沒在大量的譬喻和引證中，如果不是我們加以推理和引申，讀者很難會把它們與主題聯繫起來。可見，若把《勸學篇》當作議論文，用這樣的行文來論證，顯然是無力的。現在的邏輯學家綜合古人的說法，把這種譬喻式寫作叫做“推類方法”——即取切近淺顯事例的某種意義來說明另一事物也具有同樣的意義，<sup>⑤</sup>《勸學篇》就是用“青出於藍”、“冰寒於水”中所有的日積月累的意義來喻指“學不可以已”的道理。這種方法可以指出對象的某個方面的大體特徵，卻很難進入內部，很難表現對象外部的清晰邊界和內部的合理結構，因而無法對事物以及事物間的複雜關係做進一步的、具有必然性的分析，當然也就無法完成科學研究的任務。

那麼，究竟應該怎樣做才算合乎學術論文的規則呢？我以為，找到關鍵詞，打開它，即下定義，做劃分，這樣才能走上分析和論證的軌道。若以《勸學篇》為例，標準的寫法應該是這樣的：第一步，找到“學不可以已”中的關鍵詞，那就是“學”字，下定義，弄清楚“學”指的是什麼，由哪些部分且怎樣構成；然後再明確“持之以恆”（“不可以已”的正面）的含義；最後，看“學”和“持之以恆”之間有怎樣的聯繫，即兩者的諸外延之間有怎樣的關係。這就是論證，這樣的論證就可以給“學”為什麼要“持之以恆”（“不可以已”）提供一個具有必然性的、準確而清晰的答案。

《勸學篇》是千古名篇，這裡不過是借用來做了一個小小的遊戲，目的是幫助我們瞭解普通散文和學術論文的差異。在今天所見的文稿中，仍有許多未能把要討論的問題上升到概念的層次上來。文章主題不作概念定義，要想做到結構合理，層次清晰，論證具有必然性，是困難的；而

繁冗拖沓、論證效率低下卻會成為常態。

時下經常見到以“高校道德教育”為題的論文，作者往往習慣於從經驗上，把這個學術問題具體化為學校職能部門的某項工作。例如，除了黨團組織，一定會想到食堂還能做什麼貢獻？就業指導辦公室還能做什麼貢獻？其他職能部門還能做什麼貢獻？可是，像這樣平面地推開，創新的餘地就很有限。道理很清楚，高校再大，能做相關工作的機構也就那麼多，寫完了，還寫什麼？

我從來不認為高校思想品德教育這個題目不能寫，關鍵是怎麼寫。我們編輯部曾經收到過這樣一篇文稿，題目是《從理性和信仰的關係反思高校道德教育》。一看題目，就感到與眾不同，有深度，有內在氣質。文稿第一節談高校道德教育的尷尬現狀，下面的第一目“德育知識之界限模糊不清”，從標題就可看出有概念意識。該文以德育知識、德育實踐、德育信仰作為“道德教育”的內容，其實就是“道德教育”的三個構成要素，也就是概念的外延，或曰種概念下的屬概念。文稿恰恰是通過這三者之間的關係，看道德教育的出路，有一定理論性，也有一定新意。這篇文稿發表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上，發表後不到一年時間裡就不止一次地被引用，這說明文稿質量的確不錯。我講這個故事，意在說明概念分析在論文撰寫中的意義，是有實例可證明的。同時也說明，我們做編輯的，應該有用概念分析方法審查稿件的自覺。

總之，作為學術期刊編輯，我們要看文稿是否從“打開”概念開始，判斷和推理是否合乎思維規則。要做到這些，我們自己就得懂點邏輯知識。邏輯學家說過：邏輯是一把“斧子”，一把“思維的斧子”。<sup>⑩</sup>學點邏輯知識，我們就可試著用這柄“斧子”打開文稿的論證程序，檢驗文稿的內在質量。

## （二）看論證是否兼顧說理和用例

論證就是拿論據來說明（證實或證偽）某個論點（觀點或假設），論證需要遵循自身的規則，不過，在實際的審稿工作中，我發現，有些文稿在論證時存在兩種偏向。

其一，例證有餘而理證不足。這是一個大問題。研究者已有所見，概括為“有例無證”或“有據無理”。<sup>⑪</sup>這種情況文史類文章較多，其他學科的文章中也有。理證不足造成的最大問題是例證效率不高、價值不大，甚至無效。目前的情況是，完全無效的論證並不多見，效率不高，價值不大的較多。比如，最有代表性的表現，就是迷信所謂實證研究，拿著舶來的一些模型和公式，填入若干中國資料（元素），以為就是創新了，事實上放棄了創造性的理論思考。近年來有人寫文章批評這種現象，分析了經濟學論文模型泛化的表現和成因，指出三個原因：其一，海歸學者的影響；其二，國內主流學術期刊的導向；其三，作者專業水平的局限。文章指出：“國內帶有數量模型的經濟學論文與國外頂級經濟學期刊帶模型的論文有著顯著的不同。國內經濟學論文的模型多為模型的應用，有關這些模型理論方法方面的拓展、完善或全新模型的設計方面的論文卻很少。相反地，國外頂級經濟學期刊的論文，則更多聚焦在數量經濟模型理論與方法的發展與創新上。……那些……研究成果，通常被認為是奠基性的、創新性的，代表著經濟學研究的前沿水平。”<sup>⑫</sup>該文作者因此提出，期刊界有責任把好模型關。

同一作者還撰文談到模型背後的精神，指出：

經濟學模型的構成要件分為兩類：顯性要件和隱性要件。顯性要件是變量、方程式；隱性要件是哲學、經濟學、邏輯學、統計學和數學的原理與思想。……模型的設計就是設計這些變量和方程式的組合形式，模型的應用也就是方程式和聯立方程式的求解。……一個經典的經濟學模型理當是哲學、經濟學、邏輯學以及統計學、數學知識的完美組合。



這種多元知識體系的精巧整合，使得模型形神兼備，構成了經濟學模型的精神。<sup>⑨</sup>

其實，使用模型不是不可以，但是，要明白，沒有什麼模型可以脫離理論思考，可以脫離理性思辨，經驗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實驗主義）這個英美傳統與中國古代的經驗（體驗）主義大相徑庭，就恰恰證明了這一點。正如上述文章作者所言：“一個數量模型的設計和應用包含豐富的哲學思想和嚴密的邏輯思維”，“沒受過長時間系統正規的專業訓練，沒有扎實的經濟學、邏輯學知識，沒有深厚的數學和統計學功底，是很難在此方面有所突破和建樹的”。我們的編輯人員應該看到，使用模型沒有錯，但對模型要有清醒的認識：模型不是萬能的金科玉律，也是需要批判的，需要理論的批判，沒有批判的盲目照搬，除了有一些實用價值外，只會流於平庸，是不會有重大的創新意義的。

以上例子只是表明某些經濟學論文創新性的不足，從寫作技巧的角度看，還不至於完全無效，至少這類文稿在形式上還是可以成立的。

基於工作經歷，我知道，上面說到的經濟學論文至少還有個模型、框架，資料堆砌也大概可以做到分類存放，可是其他學科有的論文，甚至連基本的結構框架都沒有，剩下的就只能是材料的簡單堆砌了，這樣的文稿是沒有論證效力的。不會說理的根本原因，就是不懂得用概念來思考，不懂得把研究上升到概念的範疇中來。沒有概念思考，自然就沒有種屬關係的劃分，也就沒有結構層次可言。這類文稿的最大特點就是關鍵詞不定義，不劃分，一上來就說事，這是一個通病，也是它的痼疾。這種情況與我們對普通議論文中的某種習慣性理解有關，我們一直相信議論文要“判斷一件事，總是以經驗作根據”。<sup>⑩</sup>對於學術論文來說，情況應該有所不同，即在經驗的背後，應該是有理論思考作支撐的，即應該是有結構設計的，缺了這一條，就容易出現例證有餘，而理證不足的情況。

其二，例證不足導致理證無法實施。調查研究不夠，理證沒有得以建立和施展的足夠的前提條件也是一大問題。資料搜集——分類整理——結構設計——關係思考，這應該是學術論文寫作的通常程序和步驟。沒有搜集足夠的資料，沒有對足夠的資料做建構的工作，就難以形成真正的有創新意義的理論分析。從前，陳援庵先生在歷史研究中講求“竭澤而漁”，強調只有全面佔有資料，才有可能做出創新性成果來，至今仍有重要意義。

我讀過的一些文稿就存在這類問題。曾經有一位熟人寫了一篇評論時下社會問題的論文，投到了國內一家著名報紙。編輯看後建議增強理論性。作者不太理解，便來問我。我仔細閱讀了文稿，建議作者下大功夫搜集相關資料，然後再談結構設計問題。作者感到迷惑不解，問道：“不是讓我增強理論性嗎？怎麼要搜集資料呢？”於是，我便與作者詳細地交流了我對文章的理論性的看法：經驗和理論，實證和思辨，應該是統一的。所謂經驗，實證，是說文章的材料，材料越充分，越有助於思考結構、層次問題。反過來也一樣。所謂理論，思辨，是說對事物內部構成的認識，這個認識越是深入，越是清楚，對調查研究、對搜集資料，就越有指導意義。沒有理論，材料是盲目的，再多也無助於認識事物的內部結構和層次；沒有材料，再聰明也無法製造出真實的結構和層次，也無法進入事物的內部，認識其本質。所以，說到文章的理論性，就是要把材料和思考結合起來的，缺一不可。材料是內含理論的材料，理論是有材料支撐和體現的理論。要提高理論性，一方面要加強調查研究、搜集資料，另一方面要根據材料做結構、層次的建設。這樣認識的事物才可能更真實。

接著，我和作者一道分析文稿為什麼存在理論分析不足的問題。我認為，原因不在於引用某

些理論知識的不足，而是缺少相應的資料。我們搞學術研究，確定了問題後，就要下功夫搜集相關資料，最好能做到竭澤而漁。有了足夠的資料，還要對這些資料做分類整理工作。分類後，又要對各類資料間的關係進行研究。資料是有結構的，而構建並分析某物的內在結構，不就是理論活動嗎？文稿之所以缺乏理論性，就是因為沒有讓理論得以施展的足夠資料，所以我建議首先要搜集資料。

總之，以上兩種偏向都忽視了資料和理論兩者間的內在聯繫：所謂實證離不開方法，而方法又離不開理論思維；所謂理論，也離不開材料，材料的多少、對材料的分析評判，都決定著理論的廣度和深度。理論和材料、說理和用例之間有著必然的內在聯繫，或者說有著同一關係，這也是編輯衡量文章內在質量時要注意的大節和要點。

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本文所談的文稿結構設計與論證方法其實是相通的，甚至說的就是一回事：最核心的關鍵詞一旦分析開來，必然就成為文稿的結構佈局。所以，結構設計好的，往往就是會論證會分析的，反之亦然。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說的都是概念問題。

#### 四、結束語

坦白地說，這篇小文不是邏輯學論文，也不能算是一篇學術論文。儘管我十分地喜愛形式邏輯，從心底裡欽佩邏輯學家，可我的邏輯知識非常粗淺，沒有能力從邏輯理論上給論題一個系統的說明，而只能把編輯工作中的點滴感受略作整理，呈現於此。熱切盼望有關領域的專家學者、有興趣的廣大讀者和我們學術期刊界的同行們都來關心這個問題，研究這個問題，幫助我們找到衡量學術論文質量的好辦法。

不過，憑著若干年來的工作經歷，我也確信，用形式邏輯關於概念的知識來衡量學術論文的內在質量，這的確是我的一個行之有效的好辦法。我推想，沿著這條路走下去，還會有許多問題值得探討。例如，除了用概念的定義和劃分的規則來衡量論文的結構設計和論證基礎之外，概念的五類（個體類、有限類、無限類、空類、全類）、五種關係（全同、上屬、下屬、交叉、全異〔含矛盾和反對關係〕）和定義的五謂（綱〔種〕、目〔屬〕、差〔屬差〕、撰〔推衍〕、寓〔臨時〕）劃分的知識對於檢驗命題（判斷）、推理和論證的準確度都會有重要意義，這些對於衡量學術論文的內在質量，同樣會有重要意義。關於這些問題，我還會繼續學習和思考。

---

①查閱圖書館和論文數據庫方才知，類似的做法並非個別現象，而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吳壽林等：《科技論文與學位論文寫作》（上海：東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63～64頁）就認為，立論的論證方法常見的有七種，它們是引證法、例證法、喻證法、反證法、比較法、因果法、歸謬法。黃巧明的《學會運用多種論證方法寫好議論文》（武漢：《文學教育》，2008年第6期）一文也持相同觀點。這比上述四種有所擴大。持類似觀點的論著甚多，恕不遍舉。

②③金岳霖主編：《形式邏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24頁。

④中國傳統學術的思維方式是否與形式邏輯相符？對此，中、西學術界有不同看法，見韓振華：《孟子是個講“邏輯”的人嗎？——基於對西方漢學視角的考察》，上海：《復旦學報》，2014年第1期。

⑤桑原鷺藏：《讀陳垣氏之〈元西域人華化考〉》，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5～146、147頁。

⑥黑格爾：《第三版序言》，《小邏輯》，賀麟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6頁。

⑦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36頁。

- ⑧劉家和：《試談研究史學的一些基本功（序二）》，柴德賡著：《清代學術史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15頁。
- ⑨⑩⑪夏丏尊、劉薰宇：《文章作法》，1926年初版，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58、60、62、74頁。
- ⑫謝志禮、李德龍：《寫作思維訓練學（議論性文體）》，北京：語文出版社，1998年，第76頁。
- ⑬陳妙雲：《學術論文寫作》，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0頁。
- ⑭杜興梅的見解相近，見杜氏著：《學術論文寫作》，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24～225頁。
- ⑮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8、269頁。
- ⑯今天許多文章學著作在討論議論文寫作方法時，都強調“喻證法”的重要性，這是古代中國人熱衷於使用的方法。邏輯學家根據先秦諸子的論述，稱其為“推類法”。推類法與形式邏輯的類比推理、演繹推理、歸納推理或有暗合之處，但它本身是不是邏輯方法，

學者還不敢確定。見張曉芒、董華、關興麗：《先秦推類方法的模式構造及有效性問題》；晉榮東：《推類等於類比推理嗎？》。兩文均載廣州：《邏輯學研究》，2013年第12期。

⑰張曉芒：《邏輯是一把“斧子”——什麼是邏輯學和為什麼要學習邏輯學》，貴州畢節：《畢節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

⑱杜興梅：《學術論文寫作》，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38～239頁。

⑲李金華：《經濟學論文：重思想還是重模型》，北京：《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8日，第五版。

⑳李金華：《經濟學模型的精神與靈魂》，北京：《光明日報》，2013年5月24日，第11版。

**作者簡介：**蔣重躍，《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主編，教授，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理事長。北京 100875

**[責任編輯 劉澤生]**